



陈国灿

吐鲁番敦煌
出土文献史事论集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煌学者自选集

陈国灿 著

陈国灿

吐鲁番敦煌
出土文献史事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 / 陈国灿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9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ISBN 978-7-5325-6231-2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敦煌学—出土文物—文献—吐鲁番地区—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2601 号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

陈国灿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2.125 插页 2 字数 552,00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6231-2

K·1491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委会

- 主 编：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 委：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柴剑虹 （中华书局编审）
 赵和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郑阿财 （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罗世平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涌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邓文宽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高田时雄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波波娃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长期引领着国际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多采，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基本始于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学者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至酒泉，从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绢本《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均作了考订，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后来由于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进入，中国敦煌学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而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起，敦煌学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为止，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学术历程，中国敦煌学界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敦煌学百年研究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百年之际，需要对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界的研究工

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利用“985工程”平台经费资助,邀请中国敦煌学界30余位专家,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名义,集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兰州大学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1400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起到了引领研究的作用。近年来,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通过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得到了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于1985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书7万余册,在本学科的科学、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研究所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可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2010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4人,毕业博士54人,14人晋升教授,其中5人任博士生导师,20人晋升副教授,33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十余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还为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先后招收的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后接收学生四十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2人,这些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百二十多项,经费一千多万元,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界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学研究的特殊性质,遵照专家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本丛书论述性著作一般以简体出版,以方便阅读;考据性著作以繁体出版,以避免录文和释文的歧义。由此繁简混合出版带来的丛书格式不统一,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酝酿、发起到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献,对敦煌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学术自述

我对敦煌学的一知半解，始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1955 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师从唐长孺教授做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唐先生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今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如果能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新材料进行研究，将会取得许多新进展。他给我们介绍了黄文弼先生新出的《吐鲁番考古记》，同时筹划着去北京阅读郭沫若从日本带回的斯坦因劫去敦煌卷子的缩微胶片。先生的教诲和他对敦煌文献的执着追求，也影响到当时处于学术蒙昧状态的我，直到 1958 年研究生毕业，我也未能进入到敦煌、吐鲁番这一学术新领域。不过，当时已有了将这门新学问作为自己奋斗方向的兴趣。

在那大跃进的日子里，我支援边疆建设，到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条件的限制，使得自己在出土文献学上的追求仍无进展。1962 年初，买到一本中科院历史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如获至宝。面对这从未见过的大量唐五代历史新资料，除了新奇、惊讶之外，尚缺乏驾驭它并与史籍相结合研究的能力，深感进入此学尚任重而道远。六十年代后期爆发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而自己又处于无权“革命”的情况下，只有闭门读书，除了将《敦煌资料》翻来翻去外，还认真阅读了向达的《唐代的长安与西域文明》，英人沈德勒所写、傅乐焕译编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盗去我国文物简述》，以及法人郭鲁柏著、冯承钧译的《西域考古记举要》等，扩大了在敦煌、吐鲁番

学方面的知识基础。同时也联想到,将来能否将这些文物文书介绍给国人研究。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吐鲁番考古发掘出土物的更大兴趣,以致对《文物》、《考古》上公布出土的每件经济文书进行抄录,并写了许多学习心得笔记。恰在这时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外交部在公开声明中,攻击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到过新疆”,说什么“嘉峪关始终是中国最西的边界”。面对这些谎言,我感到作为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用历史事实来加以驳斥,由此我更看到了敦煌、吐鲁番学之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之重大,也激发了我倾注于西域学和敦煌、吐鲁番文献钻研的热情。1970—1973年我在接受“审查批斗”期间,草成了《唐乾陵石人衔名考释》、《敦煌借贷契年代考》、《西夏天庆间汉文典当残契的复原》、《试论西突厥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等文初稿,这些旨在说明嘉峪关以西的新疆始终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论证,我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1973年对我“平反”,宣布解放。1975年因父母重病,我调回武汉大学工作。在教学中,我指导新疆学员道尔吉完成了“论土尔扈特部蒙古回归祖国的意义”的毕业论文,受到好评。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教学、科研方向,与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一想到这些,就倍感意气风发,大有可为。

1979年,受武大组织派遣,我参加了唐长孺教授领导的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工作,面对五光十色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只有从头学起,在老师的指导下,边干边学。直到1986年,在这七八年间,通过对文书整理各个环节工作的反复训练,除参与完成十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外,也给自己打下了出土文献整理学的较好基础,因为文书的整理,从辨识、断句,到定性、断代、拟题,每一环都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这也为深入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创造了条件。唐先生经常说: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一定要结合历史典籍进行研究,才能析出新义,补史之不足。遵循老师教诲的方向,在此期间,我发表了十余篇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论文，总算完全迈入了敦煌、吐鲁番学的领域。

1990年，我应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池田温教授邀请，应聘到该所做客座研究员，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新进展，以及个人在吐鲁番文书整理中的收获。在池田教授帮助下，我除了学习日本东方学界的众多学术成果，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外，还在研究所和东洋文库看到了斯坦因劫去的吐鲁番文书的全部照片；在池田温、藤枝晃教授引领下，参观了藤井有邻馆藏的全部唐北庭文书；在京都龙谷大学，与小田义久教授共同对部分“大谷文书”作了订题研究；在奈良，参观了宁乐美术馆的“蒲昌府文书”，并达成由我负责整理、合作出版的协议。在日期间，我萌生了一种将流散在国外的吐鲁番文书系统整理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设想，这个想法得到了唐长孺老师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也成了后来我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一个方面。

1991年，我以“斯坦因所劫吐鲁番文书研究”为课题，申报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科研基金“七五”规划项目，并获批准。次年五月，书稿初成，唐长孺教授大加肯定，并亲自向武大出版社写了出版推荐信，在征得老师的同意后，此推荐信后作为书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序文同时发表。

1997年，我整理的《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于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履行了与宁乐美术馆馆主中村准佑先生的友好协议，也让国内学者首次全面见到吐鲁番出土的上图下文的唐“蒲昌府文书”。

1998年，我赴香港中文大学，参与饶宗颐先生创建的“以出土文献补通鉴”的伟大史学工程，我承担了用吐鲁番出土文献补唐史的部分，最后完成了《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于2002年12月由台北的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八十年代以来，我经常到敦煌莫高窟学习、交流，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交

流、讲课,成为兼职教授。这些敦煌学基地的良好学术氛围及交流,使我在敦煌学上的素养得到了提升。

进入新世纪,甘肃教育出版社计划出一套“敦煌学研究丛书”,诚邀我参与,于是,我在八十年代以来所发文章中,选了较有新见的25篇,加以整理订正,命名为《敦煌学史事新证》,于2002年9月出版。

吐鲁番文书百多年来流散到世界各地,研究者常常心中无数,有感于此,我想聚合国内学术界的朋友共同来编一个“吐鲁番文书总目”,曾邀北京大学荣新江、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和武汉大学朱雷、冻国栋、刘安志等会商,共同协作来完成这项工作,并于1992年申报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由于资料藏于各单位及世界各地,编辑起来难度大,费时长。2005年9月由我和刘安志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编成,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由荣新江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编成,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于国内所藏,由于近年续有出土不少,尚待各收藏单位合力完成。《总目》对每件文书除介绍原貌状况外,还尽可能提供研究信息,以备研究者当作工具检索查阅参考。

吐鲁番是我经常去学习交流的地方,八十年代初,由柳洪亮所长主持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洞窟进行清理,发现了数百片古佛经残片,后与武大合作整理,我始终参与其事,主要是每件的订名,我虽为主编,实际检索查证工作是由吐鲁番博物馆的汤士华同志完成的,这项成果定名为《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于2007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采用上图下文形式出版。

2002年秋,我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正式退休,随即被台湾政治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讲授吐鲁番、敦煌学及隋唐史半年。此后连续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之聘为客座教授。在与广大师生接触交流中,我发现他们都普遍对吐鲁番及其人文、历史、文物等有很大

的兴趣,这促使我考虑把对吐鲁番文书整理的经验及相关知识,集中加以汇集成册发表,这正是我201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吐鲁番学》一书的初衷。

《新疆通史》的编纂是国家的重大项目,我感到唐安西都护府一个半世纪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一章,它充分反映出一千多年前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因此2008年我申报了《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这一子项目获得批准,项目由我指导,石墨林同志编撰,最后由我审订,已于2012年3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结合出土文献及历史遗迹对唐安西都护府开展研究也是自己努力的方向之一。

近两三年,参加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的《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的项目,对所获汉文文书参与了整理和研究,于2012年基本完成。

自2007年以来,本人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聘为特聘教授,常去开设敦煌吐鲁番学与中国中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课程或讲座,直到现在。

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在工作和不断学习中,总希望将自己学习所得为国家和民族多作一点贡献,无奈才疏学浅,其贡献极为有限,但我仍坚守着一则信条:恭谨敬业,矢志不渝;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感谢全国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发起、组织并资助出版“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宏大气魄和胸怀,使多年散见的论文得以以学者为中心结集出版,这是一项学术壮举,故此次对旧作重作整理修订补充,以不负众望耳。

2012年6月8日于武昌珞珈山

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 644

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 662

目 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1

学术自述 1

吐鲁番出土的《诸佛要集经》残卷与敦煌高僧竺法护译经考略 1

吐鲁番出土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 15

从敦煌吐鲁番所出早期写经看佛教的东传西渐 24

敦煌藏经洞魏晋写经系年订补
——纪念姜亮夫先生编撰《莫高窟年表》六十年 35

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 49

高昌国的占田制度 70

略论高昌国欠负麦、粟帐的年代与性质 93

对高昌国某寺全年月用帐的计量分析
——兼析高昌国赋税制度 109

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 124

吐鲁番所出唐代来自长安、洛阳的文书 136

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 158

跋《武周张怀寂墓志》 189

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 200

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	217
唐代行兵中的十驮马制度	
——对吐鲁番所出十驮马文书的探讨	239
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	258
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军的救于阆之役	
——对吐鲁番阿斯塔那4号墓部分文书的研究	295
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田籍簿考释	312
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	
——对吐鲁番所出两组敦煌经济文书的探讨	329
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高元祜职田案卷的考察	371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前期户税	393
唐代的“执衣”与执衣钱	409
唐代的民间借贷	
——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唐代借贷契券初探	421
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	464
武周瓜、沙地区吐谷浑归朝案卷研究	484
莫高窟北区47窟新出唐告身文书研究	514
莫高窟北区47窟新出唐贷钱折粮还纳帐的性质	528
莫高窟北区新出唐开元廿三年后沙州检勘丁租并脚及营窖 钱粮牒的复原与研究	541
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	561
关于《唐建中五年(784)安西大都护府孔目司帖》释读中的 几个问题	583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597
八、九世纪间唐朝西州统治权的转移	610
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	621

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	644
德藏吐鲁番出土端拱三年(990)归义军“都受田簿”浅释·····	662
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	675

学 术 自 述

学术论著目录·····	684
-------------	-----

我对敦煌学的一知半解,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195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师从唐长孺教授做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唐先生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今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如果能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新材料进行研究,将会取得许多新进展。他给我们介绍了黄文弼先生新出的《吐鲁番考古记》,同时筹划着去北京阅读郭沫若从日本带回的斯坦因劫去敦煌卷子的缩微胶片。先生的教诲和他对敦煌文献的执著追求,也影响到当时处于学术蒙昧状态的我,直到1958年研究生毕业,我也未能进入到敦煌、吐鲁番这一学术新领域。不过,当时已有了将这门新学问作为自己奋斗方向的兴趣。

在那大跃进的日子里,我支援边疆建设,到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条件的限制,使得自己在出土文献学上的追求仍无进展。1962年初,买到一本中科院历史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如获至宝。面对这从未见过的大量唐五代历史新资料,除了新奇、惊讶之外,尚缺乏驾驭它并与史籍相结合研究的能力,深感进入此学尚任重而道远。六十年代后期爆发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而自己又处于无权“革命”的情况下,只有闭门读书,除了将《敦煌资料》翻来翻去外,还认真阅读了向达的《唐代的长安与西域文明》,英人沈德勒所写、傅乐焱译编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盗去我国文物简述》,以及法人郭鲁柏著、冯承钧译的《西域考古记举要》等,扩大了在敦煌、吐鲁番